

社会热点透视

乐兮·忧兮 ● 中国农村潮

陈伯君 胡文忠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社会热点透视



国防大学 2 060 0778 3

乐兮·忧兮

●中国农村潮

陈伯君 胡文忠 著



国防大学 2 060 0778 3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陈丽莉

张纪亮

封面设计:文小牛

乐兮·忧兮

——中国农村潮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32 开本

13 印张

4 插页

28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5614-0709-2/D·74

定价:7.20 元

中国农村改革成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与故土相依为命的田园般的宁静状况被打破，此起彼伏的告别故土的潮流漫及天南地北，现已呈海啸之势。中国农民的命运，不再只牵动自己的心肠，开始叩击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并以不可抗拒的态势改变着中国城市的现有结构。这就是

——中国农村潮。

目 录

导语：共和国领袖之梦	1
------------------	---

上篇：海啸之势——中国农村潮起

一、洒向人间都是怨：大寨旗帜下的中国农村满目 疮痍	19
二、走出沼泽：迷惘与选择	35
三、剪断脐带的阵痛与新生	49
四、还是这片热土	66
五、“私生子”的屈辱与伟岸	75
六、大迁徙：再次决定中国命运的“农村包围城市”	96
七、长岛人歌动地诗	110

中篇：翻江倒海——中国农村问题透视

引子：流泪的红蜡烛：中国农村忧喜参半	129
八、睡眠惺忪的“雄狮”：2亿农村剩余劳力问题	132
九、“高加林”的愤怒：中国农民不平等待遇种种	150
十、国土悲歌	165
十一、八方伸来微笑的手：层出不穷的摊派	183

十二、流失的，不只是水	203
十三、中国农民在忧虑什么	223
十四、农村人口暴涨问题	259
十五、杯水车薪：“希望工程”的叹息	273
十六、传统陋习回光返照	294
十七、“华陀无奈小虫何”吗	314

下篇 知向谁边——中国农村潮流向

引子：希望与动荡并存	323
十八、“组织起来”：运用好二亿剩余劳力	326
十九、增长的极限：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	340
二十、“小村镇，大世界”：农村城市化的构想	356
二十一、双向流动与自然法则：城市人才、技术、资 金、信息流向农村	371
二十二、第二生产力：现代管理者	384
代跋：天地转，光阴迫：中国农村是最有前途的投资对象 ——与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记者乙谈话录	398
后记	410

导语：

共和国领袖之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以中国农民为主力军，以解决土地归属为中心问题的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农民世代浴血奋斗的土地梦，终于圆成。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只有热泪纵横捧着泥土的老农，才能最深沉地感受到胜利的份量和滋味。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纪元的第一页。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被中国农民唱颂的“大救星”，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现在，可以按照他的理想，“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来构建中国农民的未來了，这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制。毛泽东不仅作为农民之子在反观自身中感受了中国农民的巨大能量，更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农民的伟力。他相信这伟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中，他是唯一一位始终不渝肯定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和支持中国农民大胆想象的领导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27年历史，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感情色彩渐渐淡化，我们才有了

可能更清楚地看到那段历史的轮廓。毛泽东为解决中国农民走上富裕道路的问题，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花了比处理其它任何经济问题都多的心血，现在这样说，可算是盖棺定论了。

由此可以说，毛泽东是怀着无比的遗憾离开他深爱着的人民的。因为现实，离他所设计的蓝图相去甚远。1976年，中国农村在愈演愈烈的“学大寨”的折腾下，已经鹤去楼空，满目疮痍了。这样的现实，预示了毛泽东倡导的农村模型——人民公社制走向终结，成为这之后农村潮起的历史基础。

历史是环环相因的链条。要是没有人民公社制的沉痛代价，人民公社始终是一张诱人神往的蓝图，就不会有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畅通无阻、目不旁视地推行了。既然是环环相因的链条，画出今日中国农民的形象，透视中国农村潮起的走势，我们的目光还得落在那功过难分、辉煌与伤痛交融的人民公社的史页上。

那时，中国历史的车轮，仿佛憋足了气似的，以雷霆万钧之势旋转。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群众的建设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共产主义几乎指日可待。形势喜人，形势逼人。面对政治局里有的同志充满疑虑的眼光和气喘吁吁跟不上趟的样子，毛泽东批评说：“我们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

快了。”

到1955年底，原计划用18年时间来完成的农业合作化，提前13年完成了。是大跃进，还是大冒进，在当时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评估。事实上，突飞猛进的农业合作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已经暴露出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并在1955年的计划会上提出要把计划会开成一个压缩指标的“促退会议”。到1956年党的八次代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以及薄一波、李先念都发表了既要反保守主义，又要反冒进的讲话，力图遏止冒进的态势进一步膨胀。

1956年底决算，中国出现第一个赤字年。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算。这一年的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52年不变价计），完成了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年均增长4.7%。这一增长速度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速度相比，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与1956年比，1957年农业的发展速度开始缓慢，好多计划都未完成。是谁之过？是热情代替不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还是冷静窒息了生产热情？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把1957年的农业发展速度缓慢归结为1956年的反冒进行动。1958年1月11日至12日，杭州九省二市书记会上，毛泽东突然把周恩来指示写出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和李先念关于批评冒进的言论，作为错误言论的材料印发。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

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接着毛泽东又指出：反冒进者是促退派，离右派只差50米。讲完此话，他转过头看了周恩来一眼。

到了3月15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守思想，并叫他们在全国人代会上检讨自己的“保守主义”。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县，肯定了县委书记张国忠在全县倡导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经验，并希望徐水县在共产主义试点方面摸索出一条新路子。此后8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与河南省委书记的交谈中，以及在山东的视察期间，都明确阐述了自己支持人民公社的态度，决心把公社化热潮迅速推向全国。

毛泽东执意力排众议，在农村全面实施人民公社制，国内外专家都爱把这一行动归结为诗人气质使然。我们的看法不尽如此。翻读历史，不难看到农民们一次又一次失去土地的记载。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农民变相失去土地的事也时有发生。为了使土地不再流向个别人的疆域，为了使中国农民，不论是精明强干者，还是老弱病残者，都能与土地相依为命，人民公社制是根本性的保证。同时，鉴于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人民公社制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毛泽东语）的性质，一旦战争爆发，便于组织民众打仗和减轻个人在战争中蒙受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制是他一直在寻找而又终于有了现实可能的生产关系。早在1919年春，毛泽东就拟定了一个十分详尽的“新村”计划书：“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

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青年时代的理想是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毛泽东从小社并大社，到在大社基础上搞人民公社这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看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早日实现的希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日出，他不容许这伸手可及的希望从他们这一代人的眼前溜掉。这一年，即1958年，毛泽东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以确保希望变成现实。这就是确立个人权威：“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他要把舆论、民心统一到同一目标上来。

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历史的步伐。这是巨人的步伐。政治局委员们几乎都感到有点跟不上。

岂止是政治局委员们感到跟不上巨人的步伐，就连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都感到震惊。在赫鲁晓夫的计划里，苏联还需要12年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而中国，以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为起步，预计五年之后，即1963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了。

如愿以偿的话，全世界都会被抛在老远的后面。

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再次来到徐水县，帮助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临行前，带了三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哥达纲领批判》，还有一本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什么要带康有为的《大同书》呢？有些干部疑惑不解，问陈正人：“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领，后来成了保皇派，不就是反面人物吗？他的书能读吗？”

陈正人：“能读。这是毛主席一再向党内干部推荐的必读书。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

问：“《大同书》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答：“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主要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业、乱、贵、苦诸界，建立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社会。这是《大同书》的主线。”

看来，照陈正人的理解，毛泽东推崇《大同书》是因《大同书》的思想，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新村”理想，与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陈正人是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他再次到徐水县蹲点，自然不辱使命。

陈正人到徐水县后，很快就帮助搞了一份《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有如下内容：

工业：县里要建一座有 300 台机床的机械厂，还要建联合钢铁厂、化肥厂、联合纺织厂、水泥厂、酒精厂、淀粉厂、制糖厂、人造石油厂、综合化工厂、炼焦厂、热电厂。

农业：原有耕地 79 万亩，1959 年要扩大播种面积到 160 万亩，平均亩产 3000 斤，到 1962 年亩产 8000 斤，播种面积

缩小到 64 万亩。

文化：7—10 年内把 30 岁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学或高等专科文化程度，县办综合大学一所，各社办综合大学一所，各村办红专业余大学。

生活水准：1963 年人均分粮 2000 斤，食油 50 斤，肉类 300 斤，棉布 100 尺，糖 240 斤，水果 147 斤。……

全县供给制方案如下：

伙食标准：农民、在校中学生每人每月 5 元；幸福院每人每月 4 元，托儿所幼儿每人每月 2 元，工人每人每月 10—12 元，县级干部 18 元，一般干部 12 元。

服装和日用品发放：农民每人每年单衣 2 件，两年棉衣一套，帽子一顶，每年鞋子 4 双，袜子 2 双，肥皂 2 块，香皂一块，毛巾 2 张；工人多一双袜子，4 块肥皂，2 支牙膏，干部比工人又多一件衬衣，2 块肥皂。

津贴费：农民每月 1—3 元，幸福院老人和学生每月 3 角，工人分七级 1—16 元，干部分四等，16 元、12 元、8 元、6 元。劳动者每 10 天一张澡票，25 天一张理发票，每月一张电影票，看病免费。

34 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规划，除了亩产 8000 斤还能引起一点惊诧外，其余都不足为奇。但 34 年之前的中国是一穷二白，才从苦难深重的历史里挣脱出来不久，对于普遍文化水平低，见识少，思维单纯的农民来说，这些规划，确实是世代梦寐以求、多少有点“天堂”意味的蓝图了。在伸手可及的理想面前，人民群众怎不“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呢？当时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成立人民公社就是实现共

产主义的第一步。”“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行不行？”台下的群众齐声应道：“行！”他接着又说：“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一共亩产就提高了，就能达到 2500 斤。共产好不好？”台下群众齐声再答：“好！”

在典型的督促下，这年（1958 年）年底，全国 74 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2.6 万个人民公社，全国 90% 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将几十乃至上百的经济水平、贫富条件不均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公社以社为单位，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主要体现为令过来人一回想起就不寒而栗的“吃大锅饭”（社员的家不准冒烟，柴禾被收缴了，炉灶被掀了，铁锅被砸了）。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果树等都收归社有。农村集贸市场被取缔，家庭副业被禁止。公社有权无偿调用支配全社范围内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乃至社员的房屋、家具。

看来，彻底的共产，在中国已不是什么美好的蓝图，而是陆续成为现实的事实了。由此，赫鲁晓夫急忙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让中国同志在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件事上对对表，不要单独宣布，要和苏联统一一下步子。”

任何车轮，转速过快都有可能飞离主体。人民公社一哄而上，历史也喘息了。面对以浮夸虚报来支撑的冒进和已成事实的决策性错误，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上，彭德

怀慷慨陈词，阐述冒进的恶果，却导致庐山会议通过了连庐山也由之惊愕的《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可谓还余音绕梁，历史就“嘣”的一声散架了。这就是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在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一书里写到：仅1960年，全国人口就净减少1000万人。

徐水县雷厉风行搞共产主义，从8月到10月，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拆卸了32000间房屋，却没有资金和材料速建新房。紧接着是冬季到来，徐水县不少农民（社员）在凛冽的寒风中熬过了人民公社制后的第一个冬天。随之而来的又是缺粮，缺衣，饥寒交迫，一起袭来。大冒进换来的是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大倒退。1959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减产的情况下又下降13.6%，粮食产量3400亿斤，比上年下降15%；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下降到65元，农民平均粮食消费量由上年的402斤下降到366斤。这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每一个农民要迎接忍受饥饿40天的考验。

这场考验延续了三年。就算是自然灾害引起的吧！那么，至少说明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即使是人民公社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对自然灾害无可奈何。

事实上，加重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浮夸，虚报。为了证明大跃进是正确的，为了证明人民公社制优越无比，各行

各业开展了一场瞒天过海的浮夸竞赛。仅从1958年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看出：7月初，江西西平县太安乡农业社早稻产量达2682斤。一个月之后，8月13日，《人民日报》用大红套字印标题《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达36900多斤。早稻之后是中稻，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000斤。天津新立村公社为了说明亩产120000斤，把几十亩稻子移于1.04亩田里，并叫人坐在稻子上接待参观者，还加以图片报道。在这股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恶劣风气的驱使下，中国农科院一些专家也发表文章，充分论证中国人民公社化后农业高产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潜力。

“事实”和“专家论证”加剧了浮夸风的恶性循环。并不是中国农民看不清楚这些浮夸都是无稽之谈，并不是中国农民不清楚这些无稽之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严重的灾祸，只是，在全社会竟放“卫星”的热浪中，指出这些“卫星”都是“皇帝的新装”，不仅无济于世，而且还会引火烧身。于是乎，高估产带来高征购。为完成高征购，一些地方不惜对农民采取捆、绑、吊、打等手段。一份资料记载，河南信阳地区，为征购粮食，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1774人，有36人死于狱中；拘留了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

毛泽东，这位对中国农民怀有深深敬意的领袖，很快就知道了事态的严峻性。据他的警卫员回忆，当警卫员讲到家乡农民的困苦境况时，毛泽东也潸然泪下。1958年11月28日，中央在武汉召开了重要的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对干部谎报数字、盘剥农民的行为表示趋怒，甚至支持农民以瞒产对抗干部的平调。五个月之后，八届七中全会召开，对原来

的高指标有所调整，又过了三个月，即1959年7月，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庐山政治局会议召开。按当时的惯势，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反“左”抑制恶性膨胀的“浮夸风”。这无疑是为反对人民公社开了一个缺口。有人在会议上说：“西平县因为放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迫害的有10000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提意见最尖锐的是彭德怀，他几乎毫不掩饰地把矛头对着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嘛。”“主席去这个公社，我曾问过他，您了解的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了。”“大跃进是一个错误。对这个错误，人人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在内。”（见《毛泽东传》）会议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上了那封著名的《万言书》。看来，从这一缺口里涌出来的反对言论太猛烈了，如不及时堵塞，刚组建的人民公社就会溃不成军。于是乎，庐山会议迅速从反“左”转向反右。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刹那间，庐山肃穆，风不动，云不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万马齐喑，不再听得到怀疑或反对人民公社的言论了。

一再坚持尊重历史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眼睁睁地看着超负荷飞转的历史大散架。1959年至1961年，是共和国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里写到：全国仅1960年，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这是有权威性的统计。刚形成的人民公社就承受了一场巨大的天灾人祸的袭击。是吉兆，还是凶兆呢？

人民公社向何处去？